



加快军事理论创新

□ 张军果 孙 莉

当前，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不断加快军事理论创新步伐，在战史战例、作战对手和未来战争研究上下功夫，抢占制胜先机，才能有效履行职能使命。

着力研究战史战例，夯实军事理论创新根基

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创新不是靠凭空想象，而是靠对实践经验的凝练和升华。军事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只有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方能超越前人。军事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军史特别是对战史战例的研究，这是推动创新的源头活水和根基。

从世界作战理论的变迁史看，无不跟随作战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超级大国谋求核霸权、核均势、核威慑，产生了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核威慑军事理论。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使局部战争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有限战争理论及特种战争理论代表着世界军事理论现代化的新成果。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军事革命兴起，信息化战争登上历史舞台，信息时代的战争理论成为世界现代军事理论的新主题。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变，有着浓厚智能化色彩的现代世界新军事理论正在形成。

从我军联合作战理论形成过程看，也是伴随着对一个个鲜活战例的深刻总结而发展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军合同作战体系下联合作战理论探索阶段。通过抗美援朝、对印边境反击作战、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次战争实践，初步形成了以陆军为主的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是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的发展阶段。基于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

争、伊拉克战争的研究，形成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建立了统一、权威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根据战略环境及目标变化，深入研究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及时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理论及信息化联合作战理论。2020年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军事冲突，无人机在战场展示威力。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时提出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思想，使我军联合作战理论发展史表明，理论创新源于对战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只有紧贴战争实践，善于从经典战例中探寻新的规律，军事理论创新才有不竭的智慧之源。

军事理论工作者，既要重视对中外古代、近代经典战例研究，更要重视对外军现代战例研究。比如，美军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车臣战争、俄格冲突、克里米亚军事行动、叙利亚军事行动，以及2020年纳卡冲突等。通过对外军这些经典战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不同国际背景下、不同技术条件下作战形态的重大变化，从中探寻现代战争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战争形态发展走向，进而指导和引领我军未来军事斗争准备。

着力研究作战对手，激活军事理论创新动力

要战胜对手，必须研究对手、熟知对手，既要清楚对手的优势和杀手锏，又要熟知对手的软肋和七寸。唯有如此，方能做到避其锋芒、直击要害、一招制敌。瞄准对手胜战的创新，为军事理论创新找到了源头活水，找到了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

强化对作战对手的研究，不仅要

研究所有可能的作战对手，更要集中精力研究最主要的作战对手。比如，美军在研究先进军事理论方面之所以总能走在世界前列，与其不断寻找作战对手并持续跟踪研究分不开。美国的兰德公司，一直深耕军事战略领域，将主要战略对手的军事理论及军事实践作为研究重点，并实时向美国国防部提供相关报告。在此基础上美军结合自身发展阶段不断更新作战理念、完善军事理论。其持续研究作战对手的做法，很值得我军借鉴。

在对待作战对手问题上，做到能够正视、善于应对、认真学习。能够正视作战对手，做到既客观评价作战对手，又客观评价自我。在敌我双方对比中，清醒看到敌我双方长短板和强弱项，面对强大对手不畏惧，面对相对弱小对手不藐视。善于应对作战对手，通过对经典战例和作战对手最新军事动向深入研究，弄清对方的战略意图，依据敌我双方的长短板、强弱项，找到制衡破敌的科学之法。认真学习作战对手，充分看到对手的优长，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补我所短、固我所长，更好地找寻破敌之策。通过深入学习研究作战对手，探寻对敌作战规律，尤其是针对其短板弱项，找寻到突破口，以形成行之有效的对敌作战理论。在此基础上，还要紧密结合我军实际，加快完善与之相应的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军事战略和军兵种、武警部队发展战略，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

着力研究未来战争，把握军事理论创新指向

理论创新，既来自于实践，更要引领实践。军事理论创新，目的是指导下一场战争，引领未来战争。强化对未来战争的超前谋划、设计、研究，是军事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价

值所在。

前瞻性研究未来战争特点和制胜机理，与时俱进创新战争和战略指导，是获取制胜先机和战略主动的关键所在。在军事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下，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形态的发展趋势，紧盯未来战场，强化对未来战争的前瞻性研究，是打赢下一场战争的紧迫要求。在互联互通的信息时代，世界上的每一场战争都像“直播”一样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要根据信息技术在现代战场广泛应用的特点和我国面临的特殊风险挑战，紧前研究设计出适合我军作战特点并能克敌制胜的战争方案。当前智能化战争正在向人们走来，美、俄、以色列等国军队，注重智能化战争和无人化作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推出“蜂群”作战、族群作战、人机协同、基于无人作战的分布式杀伤作战理论等。在此背景下，我们只有紧盯未来战场，在军事理论创新上高人一筹，并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才能保持我军特有的制胜优势。

紧盯未来战场，必须聚焦技术尖端，牢牢把握军事理论创新指向。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往往会孕育出新的军事形态，这就要求军事理论创新必须紧跟最新尖端技术的发展走向，敏锐捕捉军事形态发展的新趋势，对未来战争发展方向作出准确新预判，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眼观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5G、高超声速等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不指引着未来战争的动向，引领着军事理论创新的走向。借助兵棋推演、AI模拟等技术，通过在实验室中实践战争的方式预演未来战争，是紧盯未来战争新动向、创新军事理论指导的重要方式。聚焦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全域作战，善用“技术+谋略”的作战理论生成模式，敢于提出颠覆传统作战理念的新战争概念，借此加快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先进作战理论，以引领我军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攻坚克敌的蟠龙战役

□ 卓翔 陈丽娟

调动敌人，掌握战场主动权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25万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妄想凭借军事优势首先解决西北问题，攻占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达到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而后聚歼的险恶目的。其中，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的主力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的15个旅约14万人。彼时，我军在陕北的总兵力仅有刚组建不久的西北野战兵团6个旅2万余人。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且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延安，充分发挥解放军部队民情地熟、群众基础好、战略战术强等优势条件，灵活机动，连续转战，力争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取得最终胜利。西北野战兵团积极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大胆采用“敌进我进”运动战思想，大迂回、大奔袭，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捕捉战机，牢牢掌握着西北战场主动权。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40公里处，四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交通干道咸榆公路穿山而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蟠龙后，修筑了许多工事，囤积了大量物资，将其作为重要的前进补给基地，安排了重兵防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巧妙布局，诱敌深入，以第2纵队第359旅一部、第3纵队独立第5旅及绥德军分区部队伪装成主力向北进发，造成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绥德地区集结东渡黄河的假象，吸引胡宗南将主力部队调往绥德地区，为我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创造条件。而此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仍在瓦窑堡以南地区休整，正在进行攻占蟠龙的攻坚准备。

面对我军佯动，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的胡宗南果然上钩，以整编第1军、第29军等共9个半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经瓦窑堡向绥德地区疾进。敌军主力北上后，蟠龙就成为孤立据点，防守敌军不足1个旅，在敌我兵力局部对比上明显处于劣势，这就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优势兵力、重兵攻坚，攻占蟠龙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排兵布阵，出奇制胜攻坚战

尽管通过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功诱使胡宗南部将主力北调，形成我军在蟠龙周围的兵力优势，但是当时西北野战兵团整体上武器装备较差，几乎没有攻坚重武器，缺乏攻坚战经验，面对武器装备精良、军事工事完善、地形地势险峻的要塞据点，攻占蟠龙依然困难多、难度大、风险高，是名副其实的啃“硬骨头”。

首先，守敌部队战斗力强。担负蟠龙守备任务是胡宗南部第167旅直属队加第499团、陕西保安第3总队。第167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先进，受反动反共意识毒害深，整体战斗力较强。

其次，地形地势易守难攻。蟠龙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加之守敌利用地形条件构建了纵横交错、沟壕相连的大量军事工事，各种明碉暗堡、雷场障碍、铁丝鹿寨成为西北野战兵团攻占蟠龙的重大障碍。

再次，周边敌情复杂多变。由于蟠龙守敌与周边敌军相隔不远，如果攻坚不力，将会遭遇优势国民党军回援反包围，周边敌军会蜂拥而至，一旦阻击防线出现漏洞，会造成我军腹背受敌、陷于重围的被动险境。

为了顺利攻占蟠龙、摧毁敌人前进补给基地、解决我军物资补给严重短缺问题，4月30日，彭德怀亲自上前线查看地形敌情，召开会议

研究作战方案，部署作战任务：第1纵队第358旅（欠第8团）、第1旅（欠第35团）配属第8团分为左右两翼，自西北向东南实施攻击；第2纵队独立第4旅自东南向西北实施攻击；新编第4旅分别从东北向西南、从北向南实施攻击。同时，组成南进支队，威胁蟠龙敌军侧后；安排部分兵力阻敌主力回援。攻坚部队于4月30日隐蔽进入蟠龙周围集结，深入进行战前动员，细致做好战斗准备，力争3日内结束战斗。

发扬民主，激励士气显威力

西北野战兵团发起蟠龙战役时，正值4月底5月初，陕北黄土高原已经是骄阳烈日、燥热袭人，但当时我军由于物资短缺、补给匮乏，部队官兵没有夏装，仍然穿着棉装行军打仗，给军事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为激发指战员战斗士气、鼓舞战斗热情，我军开展政治工作进行战前动员时，紧密结合作战任务，提出了“打下蟠龙换夏装”的战斗口号，将军队政治工作做得细致入微、入情入理。

在攻坚战斗中，由于蟠龙主阵地是由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67旅主力防守，守敌凭借工事火力优势顽强抵抗，加之西北野战兵团缺乏攻坚武器装备不能有效压制敌人暗火力点，敌军阵地前的障碍不能完全扫除，造成我攻坚部队进展不顺，部队伤亡较大。在战事胶着、千钧一发之际，彭德怀果断命令攻坚部队停止进攻，深入战场前线，调整攻击力量，要求一线部队发扬军事民主，总结战斗经验教训，有针对性谋划攻坚克敌办法，化被动为主动，研究新打法。这一部署安排迅速得到贯彻落实，并收到了明显成效。

各攻击部队纷纷召开战斗总结会，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让一线指战员建言献策，提出针对性攻坚战术，从而在后续战斗中有效减少了伤亡，有力推动了攻坚进展。比如，针对进攻中外壕太宽太深无法通过、攻击部队伤亡较大的问题，基层战士提出对壕作业接近敌铁丝网和外壕，以爆破手段开辟冲击道路；针对重武器缺乏，不能有效压制敌军暗火力点的问题，一线指战员提出将攻击部队进行编组，明确分工，持续性开展攻击的作战方案。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攻击部队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一举攻占蟠龙，全歼守敌，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夫妻将军甘泗淇李贞

□ 于 德 负菲菲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湖南省宁乡县人，历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甘泗淇信仰坚定、志虑忠纯、作风质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坚持真理，恪尽职守。甘泗淇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家境贫寒，生活清苦，因自幼聪慧、勤奋好学，被父母送到家乡小学读书，后从宁乡云山中学考入长沙的湖南师专，成为当地十里八乡为数不多能够走出去的读书人。在长沙学习期间，甘泗淇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立志为穷苦大众谋翻身求解放，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为党的革命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1927年春，甘泗淇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革命理论。1930年，甘泗淇完成学业回国，在中央秘书处从事文字翻译工作。一年后，被中共中央派往湘赣苏区，先后担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兼省委宣传部部长。

在湘赣省委工作期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泛滥，时任省委主要领导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无端逮捕和审押。面对这些错误行为，甘泗淇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操守，坚决抵制和反对，并拒绝揭发省委主要领导所谓的“右倾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被撤销在部队中的职务，调任湘赣省委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

民经济部部长。对于“左”倾错误思想，甘泗淇既做到毫不妥协退让、绝不违背党性原则，又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悉心尽力做好地方工作，严格坚守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甘泗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作为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直接领导，甘泗淇在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夏曦大力执行错误路线、致使红二军团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想方设法做好党组织重建工作，努力配齐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确保红二军团政治工作大局稳定。

勤勉务实，政绩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大都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又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和“扫荡”，部队武器装备差、工作条件差、生活保障差，如何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重大问题。面对实际情况，甘泗淇想方设法、群策群力，针对性开展各种活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将政治工作融入各种文化活动，要求把作为部队文化活动场所的俱乐部普及到每一个连队，丰富官兵精神文化生活，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主要在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等做好整军打仗、巩固扩大根据地、解放大西北工作。其中，1947年冬至1948年春，在甘泗淇的大力组织和领导下，西北野战军深入进行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

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升了部队整军备战的能力水平，实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新发展。“诉苦三查”期间，甘泗淇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连队，细致了解部队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细心调研新式整军运动开展情况，和战士一起参加诉苦大会，大力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成为其他解放军部队学习的先进典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主要负责全军国防工程部队政治工作。由于国防工程的特殊性、保密性、安全性、战略性等特点，施工地点多位于山、海、林、边、岛等各种配套设施相对较差的地区，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条件差，更需要积极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推进宣传鼓动工作。在甘泗淇的建议和支持下，在国家和军队经费保障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解放军总政治部克服各种困难和条件制约，对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的文化经费和配套设施设施优先分配、优先供应、优先建设，全力保障高山深处、林海雪原、边防海岛和一些荒无人烟地区的施工部队能听到广播、看到文体节目，既改善了部队文化生活，又融教于乐、乐中受教，使广大施工官兵身在苦中不怕苦、乐在苦中立新功。

革命伴侣，夫妻将星。甘泗淇的夫人李贞，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唯一的一名女将军，她和甘泗淇也是当时全军授衔将帅中唯一的一对“夫妻将星”，成为我党我军史上的一个传奇、一段佳话。在两人近30年的伴侣生活中，一同经历了革命岁月的

腥风血雨，一同经受了峥嵘岁月的苦辣酸甜，一同经过了伉俪岁月的相濡以沫，真正称得上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甘泗淇与李贞相识于1931年，彼时甘泗淇刚从苏联学成归来，李贞已经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革命”。第一次见面，李贞端庄矫健的良好形象和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就给甘泗淇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温文儒雅、博学广识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高材生甘泗淇也让李贞感觉很好。1934年经任弼时夫人陈琼英的牵线说合，两人关系逐渐确立，并于1935年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怀有身孕的李贞因辛苦操劳加之物质条件极为匮乏，造成孩子早产并在尚未走出草地时就不幸夭折，此后再也没有过孩子。经历丧子之痛后，夫妻二人相互照顾、互相鼓励，最终顺利到达陕北，共同完成了身体上、心理上、思想上的“伟大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在繁忙的岗位上继续为党和人民辛勤努力工作，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节约简朴、清正廉洁。由于李贞在战争年代失去了生育能力，他们就将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视为亲生儿女，先后抚养了20多位烈士和干部子女，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质朴情怀真挚做到了“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

